

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研究》

王元璋 余友明

1912年J·A·熊彼特在其早期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早从企业层面提出“创新”概念,并创立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创新理论。熊彼特去逝后,其追随者继承了他的观点和方法,分别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的理论成果也被广泛运用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分析中,但无论是熊彼特还是其继承者均忽视了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的理论创新的深入研究。严清华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南方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作为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终极成果,正是弥补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之不足,创造性地完成了一项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一、《研究》创造性地构建了完整的创新理论框架体系

自15世纪西欧重商主义产生以来,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家关注的中心。熊彼特学派(包括熊彼特及其后来的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注重运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解析经济发展中的动力、周期及制约因素问题,他们在创新问题上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维定式之中。针对这一状况,《研究》明确地提出了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三大创新”为内涵的完整的创新概念。作者认为:创新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追求效益的活动,创新活动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预期的实现,有赖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相互作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决定着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因此,技术创新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制度创新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经济体系的激励机制,加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为技术创新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因此,它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保证与依赖。理论创新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同时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就技术创新而言,新技术的发明、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形成无不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下进行的;就制度创新而言,无论是以个人或群体为主导的自发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创新,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下来认识和克服旧制度的局限,确定新的制定安排,因此理论创新就成为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三大创新”的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它们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所以完整的创新内涵应是“三大创新”的有机统一体。

长期以来,我们在分析各国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地注重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而实际上若没有理论创新来破除旧的思想意识或传统理论教条的束缚,经济发展是无

法实现的。如日本的经济现代化始于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首先确定的是具有启蒙性质的“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再如,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其目的就是为解放人们的思想。可见,理论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一书中对创新理论内涵的完善及三大创新关系的正确定位,有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理论创新的作用,全面把握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并以此来指导现代经济发展。

二、《研究》准确地揭示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的脉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历程。百余年中,由于战乱和政治斗争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步伐缓慢而曲折,但《研究》一书准确地划分百余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理论创新的三大阶段,并创造性地概括出了三次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作者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和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并认为在这三大阶段内出现的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经济发展思想上创建了三座里程碑,并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不同于一般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即不仅面临着封建体制的严重束缚,而且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的无情侵略。因此,孙中山所领导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既要反封建又要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如何指导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已有理论中是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的。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尚不曾遇到过这样的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不曾遇到过这样的历史背景。同时,中国古代原有的经济理论已十分陈旧和僵化。由于中国原有的经济理论是古代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已完全不能适应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既要实现古代传统经济理论向近代市场经济理论的转型,又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近代市场经济理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古代传统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是对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毛泽东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面临着孙中山时代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进行无

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时代不曾遇到过的特殊困难和复杂问题,如新民主主义时期旷日持久的武装割据局面,革命根据地特殊的政治经济和作为世界革命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革命战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5亿多农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烂摊子”基础上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等。这些情况决定了毛泽东等人既不能沿袭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思路,也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和书本上的理论,必须创建适合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的具有创新特色的经济理论,以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毛泽东经济思想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有关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座里程碑。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基础上,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需要的科学理论观点,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巨大变革与创新。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没有现存的答案,在孙中山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中没有答案,在毛泽东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现存答案。因此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研究》一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的阶段划分,既是对百余年来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理论创新的轨迹的高度概括,也是理论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观点的实证分析。作者再次用百余年的史实证明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三、《研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客观地分析了 中国百余年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

中国史学界早就有“史无定法”的主张,但面对浩瀚的文献资料,如何才能克服依靠史料中个别事物的记述或零星的

数字,得出以偏概念全、模糊不清的定性推断的毛病?答案就是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书重点研究的是中国百余年理论创新的轨迹和具体内容,每一个理论或观点的提出,离不开历史背景,只有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的真实面目,才能客观评价一种理论或思想的价值,但是也不能完全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条件,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才能判断出一种理论或思想的创新和局限之所在。为此,作者采用科学的比较分析方法,既从横的方面比较某种理论的长短高低,也从纵的方面比较某种理论的是非曲直,从而比较准确而客观地揭示了某一理论的创新之处。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的理论认识经历了一个由高速增长理论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如何才能正确评价不同阶段经济发展速度理论的贡献和创新之处呢?《研究》一书首先从横的方面肯定了高速增长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因为后发型国家一般都面临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供求严重失衡等问题,因而他们在发展初期一般都会选择高速增长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在实践上确实使后发型国家较快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基础,所以作者首先肯定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高速增长思想的合理性。但作者也分析毛泽东等人高速增长理论存在夸大制度优势、夸大个人主观能动性、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浪费资源现象严重等问题,因此,邓小平在总结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内涵的经济发展速度思想。这一思想是对毛泽东等人纯粹靠大量要素投入换取高速度思想的重大创新。同时,作者从发展的角度又进一步分析了以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即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之,《研究》一书通篇采用比较分析法,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N)

(上接第125页)则中开展正常的竞争,使各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并购重组。因此,企业并购重组,实行有效集中的过程中,政府仍有必要实行适当的再管制。再管制不仅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比较新的理论,在实践中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在中国,对自然垄断行业放松管制后由于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实行再管制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的再管制经验,结合中国的实践,对管制体制进行改革,调整管制政策,改变管制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三,进行相关立法,以适应放松管制的新形势以及管制体制的改革。管制改革要以管制立法为先导,按法定程序进行。例如,美国是在1978年颁布了《航空业放松管制法》以后才进行航空业放松管制的改革。中国的放松管制改革沿袭的是一种先改革、后立法的传统。正是因为管制立法体系的严重滞后,才导致前述诸多问题的出现。即使颁布了相应法规,由于这些法律一般由行业主管部门起草,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在已颁布的一些法规中缺乏统一执法机构使得各管理部门责权不等,执法尺度不一,相互推诿。因此,为了适应民航业的改革,提高政府的管制效率,必须针对民航业的经济技术特征,对政府管制机构设置,权责划分,市场结构的重大调整,被管制企业的权责利关系,有关

价格、服务质量,市场准入等各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最迫切的是加快制定出台《中国航空法》以规范民航领域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中国交通年鉴编委会:《中国交通年鉴》(1990-2002),北京,中国交通出版社。
2. 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中国经济年鉴》(1996),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3. 马建堂:《结构与行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4. [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 苗维胜:《市场化是中国民航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载《经济研究参考》,2000(31)。
6. 黄为:《航空运输政策与航空公司竞争》,载《民航经济与技术》,1999(6)。
7. 江可申、李文绅:《从美国航空市场发展看市场竞争形态的演变》,载《世界经济研究》,2000(4)。
8. 课题组:《我国民航运输企业改革与重组的思路研究》,载《管理世界》,2000(4)。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 济南 250014)
(责任编辑:N)